



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 知识、理性与社会 ——以秦巴地区D村和W村为个案

黄祖军 著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Education Investment for Their Children:

Knowledge,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 A Case Study on D and W
Villages in Qinba District



科学出版社

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 知识、理性与社会 ——以秦巴地区 D 村和 W 村为个案

黄祖军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长期以来,学者对农民行为的研究一直带有二元对立思维,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争论。本书试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本书以秦巴地区D村和W村为个案,从社会理性人视角出发,以行为与结构关系研究的社会建构论范式为分析工具,具体分析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生态场域、现实表征、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等内容。本书揭示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即以理性为中介,农户行为和结构约束的互动与相互建构。

本书可为从事农民对子女教育、农民行为研究方面的相关人员提供参考,可作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参考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知识、理性与社会:以秦巴地区D村和W村为个案/黄祖军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03-057222-6

I. ①农… II. ①黄… III. ①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研究-中国 IV. ①G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4583号

责任编辑:张展孟锐/责任校对:韩雨舟

责任印制:罗科/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成都锦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5月第一版 开本:B5(700×1000)

201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 3/4

字数:260千字

定价:7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本书从社会理性人视角出发,以行为与结构关系研究的社会建构论范式为分析工具,揭示出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即以理性为中介,农户行为和结构约束的互动与相互建构。本书克服了以往对农民行为研究的片面性和简单化。以往研究要么只看到农民行为是理性的,过于强调农民行为的自觉性和意图性,忽视了各种结构约束因素,甚至偏于农民理性是纯粹经济理性的论断;要么只看到各种结构因素对农民行为的约束与限制,贬低或扼杀农民的理性,忽视农民行为的主体性和意图性。

长期以来,已有研究在农民行为和农民教育投入上往往脱节,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忽视了农民教育投入行为,对农民教育投入的研究多从经济学方面研究投资收益,很少涉及对农民行为的探讨,造成社会学意义上对农民教育投入行为研究的空缺。而通过对个案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存在差异和变化。鉴于此,本书围绕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回答和解释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差异和变化的原因。

为了揭示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本书具体分析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生态场域、现实表征、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等内容,层层衔接,进行阐述和剖析。首先,对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生态场域进行分析,为理解和探讨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提供现实语境和社会意蕴。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实践场域是社会转型期教育内卷化,一方面,教育“有增长而无发展”;另一方面,教育的边际报酬递减。其次,具体剖析调查所在村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所表现出的差异和变化。差异主要呈现出不同农户教育投入的观念、行为差异,以及同一农户在子女不同教育阶段的投入行为差异。而变化既呈现出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变化与具体情境相关,也表现出教育投入观念、动机和行为选择的变化。最后,深入挖掘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差异与变化背后的深层机理,揭示了农户教育投入行为具有理性与实践的双重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表层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差异与变化源于农户行为的理性逻辑:一方面,表现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现出在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变化。从深层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差异与变化源于其实践逻辑。在实践中,农户的理性行为受到家庭、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约束和限制,在各种结构因素约束下,农户理性选择

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并随具体情境的变化而调适目标和行为。

总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这也是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差异与变化的根源。农户从追求生存、经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社会声望、情感等社会收益最大化目标出发，权衡子女、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做出是否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决策。当子女、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发生变化时，在新情境下农户反思并调适先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确立新的最大化社会收益目标，做出是否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新决策。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是结构约束与农户理性选择的结果，呈现出以理性为中介的行为与结构的互动和相互建构。

本书受西华师范大学英才项目：“‘技术—社会’视角下贫困农村数字化治理研究”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问题提出	4
二、研究意义	4
三、文献回顾与述评	5
(一) 关于教育投入的相关研究	6
(二) 对农民行为的研究	10
(三) 农民教育投入行为的相关研究	18
(四) 对已有研究的评论	23
四、概念界定、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24
(一) 概念界定	24
(二) 分析框架	27
(三) 章节安排	28
五、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29
(一) 研究方法	29
(二) 资料来源	30
第二章 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生态场域：社会转型期教育内卷化	31
一、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生态场域	31
二、社会转型期的教育发展	32
(一) 社会变迁与转型	32
(二) 社会转型与教育	34
(三) 中国社会转型与教育困境	36
三、社会转型期教育发展困惑：教育内卷化	37
(一) 内卷化：对教育发展的一种分析视角	37

(二)转型期教育内卷化的表征·····	41
(三)教育内卷化的原因·····	50
第三章 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现实表征：差异性与变化性·····	54
一、调查地的区域与教育概况·····	54
二、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差异性·····	56
(一)农户教育投入的观念差异·····	56
(二)农户教育投入的行为差异·····	60
(三)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投入行为差异·····	75
三、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变化性·····	78
(一)农户教育投入行为变化的内容·····	78
(二)农户教育投入行为变化的特征·····	81
第四章 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理性逻辑：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	82
一、农民的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82
(一)农民的生存理性·····	83
(二)农民的经济理性·····	84
(三)农民的社会理性·····	88
二、农户理性教育投入行为差异与变化·····	89
(一)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	89
(二)理性变化中的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取向·····	92
第五章 农户理性教育投入行为的张力：家庭、社会与文化约束·····	93
一、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微观约束：家庭·····	93
(一)家庭子女结构与农户教育投入行为·····	93
(二)家庭经济资本与农户教育投入行为·····	98
(三)家庭文化资本与农户教育投入行为·····	103
(四)家庭社会资本与农户教育投入行为·····	107
二、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宏观约束：社会结构·····	113
(一)行为的结构性限制·····	113
(二)城乡结构·····	115
(三)教育体制·····	119
(四)就业市场·····	120
(五)户籍制度·····	122

三、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隐性约束：文化	124
(一)地域文化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	125
(二)“命”“福”观念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	125
(三)父母的角色规范、利他观念与农户教育投入行为	126
第六章 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实践逻辑：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	128
一、结构约束与主体选择	128
(一)结构与行动的互动	128
(二)结构约束下农户的理性选择	132
二、农户理性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建构过程	135
(一)农户理性教育投入行为的文化建构过程	136
(二)农户理性教育投入行为的情境建构过程	139
(三)农户理性教育投入行为建构过程的特征	142
三、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双重嵌入逻辑	145
(一)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实践逻辑	145
(二)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双重逻辑	147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149
一、主要研究结论	149
二、研究展望	151
主要参考文献	152
附录 1 访谈提纲	160
附录 2 调查问卷	162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一)研究缘起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教育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教育既面临许多发展机遇,也出现了许多困境。而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特别是其投入的行为特征,对把握农户教育的投入现状、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看,我国教育既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也面临令人困惑的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领域也开始改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和21世纪的前几年,教育改革步伐加快,这是中国教育规模迅速扩张的时期。国家对教育的一系列改革,有三点值得关注。①改革高等教育,实行高校收费制。1997年,中国普通高校实行全面“并轨”,开始实行收费制度。此后几年,高等教育的学费一直呈上升趋势。1996~2000年,中国高等学校教育学费的年增长率保持在25%左右,而1998~1999年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费增长率更高达44%。根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学费占居民收入的比例大幅提高,到2002年,高等学校学费支出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从1996年的68.6%飙升到177.6%,占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1996年的37%上升为77.3%(刘民权等,2006)。②高校规模扩展迅速。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现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开始了,曾一度停滞,20世纪80年代高校规模也有一次扩展,但规模比较小。而20世纪90年代的高等教育扩展速度快、规模大。1990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为382.2万人,2000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上升为847.9万人,增长迅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1)。③国家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建设力度。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快速发展,农民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我国目前已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性任务。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重视农村教育,并已逐步形成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这个保障机制从学费、教育经费、校舍维修改造、教师工资等多个方面来发展农村教育。特别是2008年秋,国家决定在全国城乡实

施免费义务教育，这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政策和措施，为农村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但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一些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①教育规模日益扩大，但是教育质量并未提高；相反，有下降趋势。教育的发展还是一种粗放型的规模扩展，而不是集约型的质量提升。特别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与城市基础教育的质量差距越来越大。②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实行全面的收费制度，一方面使教育经费分摊的主体多元化，减轻了国家的教育负担；另一方面，也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甚至严重影响教育的公平性，使一部分低收入家庭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甚至可能使达到录取标准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放弃高等教育机会。③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张，“教育过度”现象也较为普遍。我国过度教育的形成直接受到教育扩展的影响，也伴随知识失业而出现。最近几年，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毕业即失业现象并不少见。即使许多已就业的大学生，也从事学历层次较低的工作，导致教育资源和人才的浪费。④教育的收益呈递减化趋向。“文凭贬值”现象较为突出，高学历人才的收入较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有时还不如低学历的人。教育收益的递减化趋向，既指经济收益的递减，也包含社会收益的递减。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经济收益的边际报酬递减；另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受教育者提升社会地位、社会声誉也并非一帆风顺。

从社会变迁和转型看，教育对农民子女来说，既显得重要，也面临诸多困难。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和分层标准从过去主要依据政治出身、血统等先赋性因素转向主要依据后天个人努力、教育程度等获致性因素。教育成为社会的“筛选机器”（Spring, 1976），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Deng et al., 1997）。这并不是说家庭环境不再影响子女的职业，而是意味着优越的地位不再能够直接继承，而必须由公认的实际成就来证明其合法性（张人杰，1989）。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来说，教育是改变自身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最主要路径。教育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对个体社会流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伴随中国社会的转型，原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被打破，体制的转换带来利益关系的重组和分化，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变。新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相继出现，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形成。许多学者都对中国的社会阶层进行了重新划分，虽然划分的标准和模式各有特点，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中国当前社会存在分层，且阶层结构慢慢成型。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流动路径更为繁多；同时，阻碍流动的结构性屏障与改革开放前完全不同。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更加开放，社会流动率明显增加，经济改革前制约人们社会流动的三道制度性屏障——户口身份屏障、档案身份屏障和政治身份屏障——的影响越来越弱，特

别是政治身份屏障已基本崩溃(李春玲, 2005)。另一方面, 新的阻碍社会流动的屏障出现。有三道结构屏障阻碍了阶层的自由流动: 第一道为是否占有最重要的资源种类, 如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 没有这些资源的阶层想要跨越这道屏障进入拥有这种资源的阶层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道屏障是源于劳动技术分工或者是否拥有文化资源而导致的阶层分化, 各种学历文凭和资格认证构成了这道屏障的基础; 第三道屏障是源于是否能获得就业机会, 这主要存在于有机会争取到就业岗位的人与没机会获得工作的人之间(李春玲, 2005)。这三道屏障使优势社会阶层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增强, 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要想上升到优势阶层, 必须消除这几道屏障。而接受教育、获得文化资源又是一个可行可取的路径。特别对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较低的农民阶层而言(陆学艺, 2002), 获取文化资源有特殊意义。农民要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获得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通过获取文化资源实现流动是有效的途径。教育对农民阶层向上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重要。

在社会转型时期, 虽然教育对农民阶层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对改变农民子女命运、社会地位与声誉意义重大。但与此同时, 我们不能否认农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受诸多因素影响与制约, 使得投入行为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和复杂性。①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歧视, 给农民子女的社会流动带来了不确定性, 农民通过教育来改变孩子命运的途径能否实现, 充满变数。②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 使农村孩子身份转换和地位升迁更加困难。在城乡二元结构下, 城市与农村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农村教育落后和质量低下的状况, 使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和升学受到影响, 与城市孩子的竞争更为不平等。这种现状, 势必影响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③教育体制的改革对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影响不可忽视。一方面, 高等教育实行全面收费制度, 而在当前城乡二元分化的社会, 农民的收入增长有限, 这种矛盾的现状必会影响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 另一方面, 国家对义务教育实行免费制度, 这对农户的教育投入行为也会产生影响。④当前大学生就业难, 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并不少见, 学历呈现贬值趋向。“教育过度”“知识失业”以及教育的收益递减使得新的“教育无用论”在社会上相继出现, 特别是中国一些地方出现高中生弃考现象。这些现象难免会影响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

综上所述,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教育“市场化”以及教育文凭日益贬值趋势下, 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会呈现哪些特征? 会发生什么变化? 不同农民家庭对教育投入行为有什么差异? 在社会结构性的限制中, 农户又如何选择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方式? 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这些都是值得研究, 并且应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研究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 以及其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 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正是基于这些思考来分析和研究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及其逻辑。

(二)问题提出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一方面，教育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特别是较低社会阶层向较高社会阶层的流动起着重要作用，对农民子女而言，获取教育是有有效的向上流动路径。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屏障使优势社会阶层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增强，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农民子女的上升流动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依靠教育实现农民子女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改变越来越难。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问题也影响农民子女向上的社会流动。一方面是教育的全面收费制和“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是教育收益边际报酬递减、“文凭贬值”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教育的“市场化”以及教育文凭日益贬值趋势下，研究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既是必须的，也有必要的；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为此，本书通过实地调查，试图研究转型期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背景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表现与逻辑是什么？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基于研究需要，又进一步细分了几个更小的问题：①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现状如何？对子女的义务教育阶段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又表现出哪些不同？②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是基于理性思考还是感性思考？③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④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和限制时，农户又是如何选择教育投入行为方式的？⑤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也是本书要深入探讨和论述的具体问题。

二、研究意义

在中国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研究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这个问题，既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1) 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对社会转型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背景下农户教育投入行为逻辑的研究，首先必须对转型期中国的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和探讨。而对中国教育发展现状的探讨仍是学术界的一个争论焦点。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发展是“市场化”取向；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市场化”的提法不妥，应该是教育“产业化”（王海南 等，2000）。有学者认为，我国教育发展是“大众化”趋向；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教育仍是“精英化”取向；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教育发展表现为“过度化”（武向荣 等，2007）。总之，这些争论和不同见解都从各自的理解视角对当前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趋势做

出了解释。本书的研究也涉及中国当前的教育发展和改革,本书从教育本身的发展、教育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教育的回应角度来探讨和分析我国当前的教育发展现状,这种探讨和分析,将进一步深化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认识。

(2) 本书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农民教育投入行为的理论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书通过剖析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和农户在约束下的选择行为方式,从行为与结构互动的动态角度对农户教育投入行为进行审视,从浅层和深层两个层次挖掘农户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呈现出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理性”与“社会建构”特征,揭示了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双重逻辑——理性逻辑与实践逻辑,深化了对“农户的选择是否理性”命题的认识,从中也可以更深入理解农民行为是“道义”“理性”抑或“惯习”争论的实质,进一步丰富了对农民教育投入行为研究的理论视角。

(3) 本书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学界对农民教育投入行为的经验研究。对农户教育投入行为及其深层逻辑的研究,既是学术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现实生活中理解农户对教育的态度和背后思维逻辑的需要,还是国家今后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政策,特别是针对农民和农村教育发展政策,缩小教育不平等的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教育的“市场化”以及教育文凭日益贬值趋势下,农户教育投入行为表现出哪些现状和特征,是否会发生变化?出现哪些变化?不同农民家庭对教育投入行为有什么差异?在社会结构性的限制中,农户又如何选择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方式?本书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对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这些方面的探讨,必将丰富学界对中国农民教育投入行为的经验研究。

(4) 在现实方面,本书的研究目的是了解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教育投入行为,如何提高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促进农村教育发展有一定的参照作用。本书以西部秦巴山区经济欠发达农村为调查基础,收集第一手资料,能较好地呈现这一地区的教育现状和农民的教育投入行为,为理解这一特殊地域的农民教育观念和行为选择提供参照。此外,为当地教育部门如何提高该地区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水平,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供参考。

三、文献回顾与述评

研究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需要对相关的已有研究进行归纳,以把握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程度。而相关的研究涉及教育投入研究、农民行为研究和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研究。从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既可以吸取养分,也可以获得启发,为确立、找准本书的研究视角奠定基础。下面就对这些文献做一些回顾与评述。

(一)关于教育投入的相关研究

1. 教育投入理论

学者们对教育投入的理论研究,依据论述的角度和各自观点的不同,可以归纳为人力资本理论、技术功能论、筛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

1)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基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范畴,详细论述了教育性质、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教育的作用以及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此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西奥多·W.舒尔茨、明瑟(Mincer)和贝克尔等。

(1)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性质进行了论述,主要是对教育到底是消费还是投资问题的回答。对教育是消费还是投资问题的回答,有利于个人(家庭)和国家对教育性质的理解,同时也为个人和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行为提供理论基础。如果教育是消费活动,那么人们对教育的投入行为就将受到其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的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教育活动的价格——学费是人们消费教育的重要考量要素。如果教育是一种投资行为,那么必将带来收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将获益,而教育的投入行为也如资本家投资那样是一种前期资本预付行为。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绝大部分教育既不是纯消费,也不是纯投资,其中初等教育主要是消费教育,高等教育、专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主要是投资教育(Schultz et al., 1961)。实际上,根据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概念,通过高等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远非是同质的。其部分是消费的,部分是生产的。而且,消费和生产两部分还各有许多不同的类型。这些人力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其提供服务的价值(单中惠等, 2000)。而对于明瑟和加里·S.贝克尔来说,他们更趋向于认为教育是一种投资行为。即便是传统上那些认为难以归入投资范畴的东西,比如卫生、保健、教育、就业调查、信息获得、迁移以及在职培训等,都被当作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刘精明, 2005)。

(2)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投入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教育的收益是教育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加里·S.贝克尔(1987)认为,“唯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这种投资的有利性或收益率”。对教育收益的测算和分析为人们对教育投入的动机和行为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的收益是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来分析的。对个人而言,人力是一种资本,个人对教育的投资会增加其收入,增加和保障其福利。人力资本是劳动者时间价值——收入提高的最主要的源泉(西奥多·W.舒尔茨, 1990)。对人力和知识的投资是保证人的福利的决定性因素。教育的社会收益主要是针对国家而言,国家作为教育投

资的重要主体,对教育的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研究表明,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发展进程明显地得益于大学所培养的工程、技术、医疗、公共与私人的管理工作、农业等方面的土生土长的专门人才(西奥多·W.舒尔茨,1990)。

(3)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投资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如上所述,教育能增进个人福利,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个人收入。投资教育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贫穷社会来说,是脱贫致富的好路径。此外,投资教育还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了美好前景,也有利于摆脱空间、能源、耕地和其他物质财富对人们处境的限制。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当人们考虑这些投资时,地球物质资源将会耗尽的预言就必然被抛弃(西奥多·W.舒尔茨,1990)。

2) 技术功能论

有关教育投入的技术功能论,主要是面对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发展,人们如何适应社会发展与科技革命的新需要而提出的研究课题。技术功能论有两个逻辑前提,一是认为教育与科技革命二者有密切关系;二是劳动者提高教育能适应技术革新的新需要。教育投入的技术功能论是从功能主义视角来分析和论述科技革命与教育投入的关系。一般来说,科技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直接影响教育的观念、内容、技术和手段;另一条路径是通过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来间接影响教育。而科技革命影响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这条路径对人们教育投入的行为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迫使人们被动地提高受教育水平以适应这种变化;另一方面,人们为了获取更好的职业或保住已有职位,也会主动地提高教育水平。正如 Collins(1977)所认为的,技术变革使工作对技能和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技能和知识主要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因此,接受学校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以适应不同行业、职业和工作职位对人的不同要求。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科技发展本身对人们教育投入行为的直接作用,更要重视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就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对人们教育投入行为产生的间接作用。

3) 筛选理论

1973年,史潘斯发表了《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Micheal, 1973),文中系统阐述了筛选理论,是该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筛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教育的筛选作用和就业市场的符号作用对人们教育投入行为的影响。

筛选理论强调教育的符号作用,在就业市场上,教育起着信号的作用,是雇主挑选雇员的重要信息。因为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使得雇主对应聘者的劳动能力了解较少。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只能依据可见的信息来决定选聘谁、是否选聘、支付的工资水平。筛选理论认为,教育的筛选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的能力,

虽然教育不能提高人的能力，但却可以反映人的能力。正是教育具有的筛选作用和就业市场的符号作用，刺激人们为了找到好的工作岗位，增加工资水平而不断地投资教育，提高受教育水平。筛选理论认为，雇主过分地依赖学历文凭作为选聘的依据，可能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若获得较高教育文凭便可获得较理想的职业岗位和优厚待遇，就会大大刺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导致高等教育的过量发展，造成教育的过度。

总之，筛选理论分析和论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教育文凭贬值下人们的教育投入行为。筛选理论认为，正是教育在就业市场的信号作用影响求职者对教育的投入行为，他们会设法多接受教育去申请好的职位，因为受教育水平是告诉雇主的一个重要个人信号。正是求职者纷纷投资教育、不断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这种教育投入行为造成了文凭泛滥的现象。

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教育投入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与教育的关系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劳动力市场是不统一、不完全的。归纳起来，劳动力市场划分模式较多，曲恒昌等(2000)归纳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垄断的劳动力市场和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不管劳动力市场划分的模式有何不同，总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好的劳动力市场和差的劳动力市场。教育总与这些劳动力市场相联系，教育水平既是不同劳动力市场区分的重要标志，又是劳动力市场划分的重要依据。正因如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入行为，人们都希望进入好的劳动力市场，而为了达成目的，便投资教育，提高教育水平。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往往存在歧视和阶级利益区别。来自下层的社会群体，即便获得了较高的教育水平，进入条件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往往也比较困难，从而降低了下层社会群体对教育的需求(杜育恒，2000)，这影响下层社会群体对教育的投入。史潘斯也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阶级利益差异和斗争的结果，穷人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往往很难，这样会造成农民持久的贫穷(Micheal, 1973)，对农民教育投入不利。

2. 教育投入的成本分担与补偿理论

教育投资到底是个人的事还是国家的事，对政府、社会和个人而言，到底谁应该为教育付费、付费的内容包含哪些、付费的比例是多少，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这也是教育投入的成本分担与补偿问题。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也不少。

(1)关于谁应为教育付费问题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系教育投资主体问题，而其假设前提就是关于教育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的回答。自 Samuelson(1954)提出“公共物品”以来，公共物品这个概念就被学术界广泛运用。

对教育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的疑问,实际上涉及教育的产品属性。教育的产品属性一般有三种分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教育是公共产品。Barlow(1970)就持此种观点,认为教育是公共物品,他通过论述美国地方学校财政效率问题,分析和论证了教育的公共性。公共物品一般由政府提供,供全社会享用,认为教育是公共产品的观点主张政府应该承担教育的全部费用,应为教育付费。第二类观点认为,教育是私人产品,具有私人性。Barr(1998)认为“教育不是公共物品”。教育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物品,即使含有一些公共物品的内容和因素,那也是非常有限的。研究表明,因为教育是私人产品,对于那些无子女的人来说,他们绝大部分人投票反对教育的政府公共支出(郑秉文,2003)。第三类观点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既不是私人产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这类观点介于前两类观点之间。中国学者对教育的产品属性研究成果也比较多,观点也存在较大分歧,但也基本上从属于这几类观点。

(2)关于教育投入支付能力问题的研究。教育的产品属性确定了,教育的支付责任和范围也就确定了,但是,支付能力影响教育的投入。学术界一般认为,初等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投入资金;中等教育主要是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和个人(家庭)共同投资,但政府应为主要资金投入者;而高等教育主要是私人产品,主要由个人(家庭)投资,但国家和社会也应该分担一部分费用。D.B.约翰斯通(2004)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一书中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其理论影响较大。但我们也要看到个人(家庭)的支付能力影响教育投入行为。对于家庭贫穷的孩子来说,上大学不得不通过向亲戚朋友借款,节俭度日或在课余与假期工作来筹集上大学的大部分资金(加里·S. 贝克尔,1987)。因此,缺乏货币是低收入家庭的优秀中学毕业生不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高收入家庭的优秀中学毕业生不上大学的次要原因(加里·S. 贝克尔,1987)。

(3)有关教育成本分担与社会公平问题的研究。对教育成本分担与社会公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个是未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时社会公平的问题;另一个是实行了教育成本分担后的社会公平问题。基本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成本分担有利于社会公平,单纯由政府教育付费不利于社会公平。弗里德曼、萨哈罗普勒斯、哈耶克等对政府承担教育成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米尔顿·弗里德曼等(1982)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成为落后的制度。弗里德曼为此主张教育市场化改革,实行教育成本和费用的分摊。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1997)认为,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有利于社会公平,因为如果教育由政府公费支付则是不公平的。他认为,“几乎毋庸置疑的是,教育虽说能够增加人们对公共需求的贡献,然而超过一定时段而加以延长的教育必须证明就此所付成本为正当,所以享